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8

筏上戈语

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玉器与先秦文化

劫·连环劫·生死劫

——新武侠小说讲故事的诀窍

二十四史检索工具书述略

严迪昌

王宜璦

彭林

禾戈

毕于洁

1990



医药学院610 2 01472483

文史知识

1990年第8期

(总第110期)

• 治学之道 •	筏上戈语	严迪昌	3
• 文学史百题 •	从《水浒传》谈古代小说的社 会学研究	骆冬青	9
• 历史百题 •	削除三藩与康乾盛世	李治亭	14
• 怎样读 •	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王宜瑗	21
诗	唐苑群芳第一香——吟咏李世民《秋日二首》之二	许永璋	25
文	人格形象的展现——说杜甫《旅夜书怀》诗	乔力	28
欣	不惜歌者苦 但伤知音稀——从更深的角度		
赏	看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词	缪钺	31
• 古代科技漫话(37) •	说锦	胡湘生	35
文化	玉器与先秦文化	彭林	40
史	唐代的御史台	胡沧泽	46
知识	漫话“孔方兄”——铜铸币演变略说之二	李邦经	51
• 武侠小说漫谈 •	劫·连环劫·生死劫——新武侠小说讲故事的诀窍	禾戈	55
人物	北宋第一位临朝太后——章宪明肃刘后的一生	李润英	60
春秋	抗倭名将——任环	范金民 周惠仓	65
• 宗教与人生 •	落成与衅礼——血的信仰之一	詹鄞鑫	69
武王克商之年的管见		赵光贤	74
清代的山水诗		陶文鹏	79

图书资料

• 古代心理诗学(3) •

美的极致与“格式塔质”

——浅议“气”、“神”、“韵”、“境”、“味”的超越性 童庆炳 83

语言 } “春酒”辨析 萧东海 90

知识 } 古代与“朋友”义有关的特殊词语 江蓝生 93

• 文史书目答问 • 《十六国春秋》 吕叔桐 96

读书 } 关于“江东三虎” 赵齐平 99

札记 } 漫话“扶头酒” 聂在富 102

• 文史信箱 • 二十四史检索工具书述略 毕于洁 104

古小说中“狐精”形象的由来及演变 段 晓 110

• 文史信息 • 魏晋南北朝的赌博之风(50)明万历时期的矿盐
税使(54)《文心雕龙》:中国传统美学体系形成
的标志(78)《金瓶梅》与《红楼梦》审美价值
比较(82)明代的皇庄(89)

• 文史古迹 • 南苑旧宫德寿寺
——清代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一处重要遗迹 李继昌 112

• 文史研究动态 •
八十年代山水文学研究纵横观 章尚正 115

• 读书札记 • 译注古文切忌望文生义 白 涛 120

• “我与《文史知识》”获奖征文选载 •
读者、作者、编者及其它 魏耕源 121
我与《文史知识》 王全力 123
良师益友话今昔 施亮如 124
共度三千天 王 健 126

• 补白 1 则 • 《兰亭序》真迹随葬唐太宗(114)

古代铜铸币图选(封二) 北京南苑德寿寺遗址(封三)

筏上戈语

严迪昌



严迪昌 上海市人。1936年11月生，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词学会筹委。主要著作有《清词史》、《文学风格漫说》、《阳羨词派研究》等，以及《清诗平议》、《万树三考》、《论黄仲则》等论文数十篇。

我们这一辈人在年龄问题上每多心态反差。自我心理总以为岁月未老，事实确已年过半百行将跨越被放宽了的“中年”界限。而学海溟濛无边涯，尽管仍在贾余勇撑筏前行，然距彼岸实实尚远。因而，“法无定法”的治学之道固无从谈起，即若连“门径”云云也难以置喙。故只能以筏上人戈戈琐语应《文史知识》编辑部之嘱，聊备谈助而已。

我大学毕业后被派遣到一所师专任教，三年后学校停办转去中学工作，前后在江头海角的一个中小城市从教二十一年，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都很难从事系统的学术研究。先后天条件都欠佳的情状，必然和我们的师辈之间在学养积累上形成悬殊差距，治学的历程也发生变易。但是，如果说“变”则正如一切事物生命力赖以不衰的动因，那末，客观环境和条件容或未必一定会制约住个人学术事业的追求。人的能力无疑存在有强弱大小的差异，然而，在整个“因”与“变”的链条中只要能增添一丁点新的因素，或许也就不枉此生。

学养既然不厚，就更需驾马十驾地不懈怠，勤快地进行自我

积累，我坚信并恪守“厚积薄发”四字原则。时间的被诸种条件分割，则求之以集零为整，不妨充当个“拾遗”者；至于资料匮乏，也只是相对而言，应对办法是：虽是小城市，常见书当仍能读到，地方性文献尤易就近觅见；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旧书铺和书摊上价甚廉却又不为人们关注甚或不屑一顾的诗文别集尚多能采购，这是我们这“过渡代”学人得以略进小补的有利条件。最没办法的办法，是抄书，还在大学读书时我就养成手抄整部整部书的习惯，凡无法购置或无力购买的自己喜欢的集子就设法借抄。后来“文革”中所有书籍以及抄本全部散失，时间一长，购置的图书不少已被遗忘，抄录过的内容却始终记忆清晰。

在我二十三岁开始执教，业余读书著文时，给自己规定二条“守则”，一是读人所常见书时，笔下务必“去陈言”，不去重复前人已论述过的东西，力求追索一点新的问题以谋得解决；二是读人所不读书时，专意于去发现一些在当年特定时空间我的水平、眼光所能发覆的有价值的内容。这后一点的最初“收获”有二：在文献方面收集到足可补阮元《淮海英灵集》若干卷的苏北通州（州）如（皋）扬（州）一线的诗人之作，惜均散亡；在作家论方面，我读《沈四山人诗录》，在1961年为这个布衣务农的诗人写了篇《沈谨学的诗》。随之由沈谨学推展及江湜的《伏敌堂诗录》，形成了《论江湜的诗》，并广泛注意到一批“寒士”诗群。我深感科举制度既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抹煞不了），也埋没了无数才人，从而又在幸与不幸的因果关联中冶锤成大量卓特的诗家。回忆起来，这不仅是我研索清代诗词的起步，而且对目前我较多注视三吴地区的文学文化课题，实是一个发端。至于前一点即读世所共见书，如读《陆放翁全集》，认为陆游数十首统归“沈园”系列的诗，既是诗人无法排遣的生平不幸事的抒露，也就关系到其整个出处进退，是研究这位大诗人必须理清楚的课题。于是比勘分辨陈鹄、刘克庄、周密三家笔记诗话的有关条文，提出自己的心得，写就《陆游〈沈园〉诗本事考辨》。读《稼轩长短句》则对其咏“春”词细加辨昧后，写了《论辛弃疾的咏“春”词》。文章的是非功过是另一回事，就我本

人而言，都属在当时特定环境中的认真之举，是恪守自己所定的准则的。这种“守则”，这样的追求，姑妄归结之为一个“新”字吧。

在研讨某一课题时，我生性喜好追根究底，力谋穷尽其境。特别是我始终认为任何时代的各个诗人作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属于共时性群体关系的网络型运动中的一员。所以，在进行文学研究的“细胞”审视的作家论时，总想网罗尽与之相关的交游人物以及家世族群的情况。这种“网罗”，目的是为弄清某个诗人作家在历史的纵横坐标上应占的位置。纵向的历时性的推源溯流，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一般比较熟谙；而横向的共时性网络群体的把握，往往为我们所轻忽。但要把握群体网络的史实，确实艰巨多辛苦，而且需有个较具备条件的环境。1980年我奉调回母校南京大学，1986年底应聘转来苏州大学工作，无疑可以较顺利地实践自己的愿望。然而史实并非现成可得，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古籍文献的整理尚属草创，总集固大多未成，许多淹没的史料更待追索梳理，尤需详加考辨始得明晰脉络、时序。这样，我又给自己归纳了三条“原则”：追综史实，借重理论，不废考据。

先说理论，我以为是拓开自己思维空间，增强思辨能力的不可或缺的武器。例如无论是纵向抑是横向探索，文学研究必须将视线较多地投向艺术个性或称艺术风格的审辨上。即辨析其异同，特别是“异”的分辨，无“异”，必难有新变，难求发展。无新变无发展，决难称之为大家或名家。而“异”，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因为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就在时空运行中不断地演化推进着，作为生活在各自特定时空中的“人”，不可能不变、无“异”，即使拟古专家也有其与“古”相异处，无非程度各有不同而已。为增强思辨性，我系统地思索了有关的问题，于是《文学风格漫说》成了我的第一本小书，作为一种前期准备，我尽可能地把问题想得细致些。

史实的追踪和必要的考据，近几年主要实践于清代诗词流派和群体的研究中。我在写《阳羡词派研究》书稿前，对活动于康熙前期三十年时间内阳羡一地近百个词人的生平行年逐一作了追索考订。其中如《万树三考》写成多时，但考虑到如果有该支万氏族

谱存在的话，那么“宗亲考”以及生卒行年钩稽都成为多余的文字，故迟迟不想发表。俟遍查海外境外所有中国家谱藏目，未有存见著录，国内馆藏这方面尚无总目，于是始敢于披露在《中华国文学学刊》(1989年创刊号，香港)。此外陈维崧词中涉及的交游五百人左右，积数年之功也已考得四百有余。为了实证所需，我还亲去宜兴多次，曾步行访查到陈维崧家乡毫村以及该词群经常聚集唱和的南岳寺、石亭等遗址。实地感受环境氛围是书斋查考文献的很必要的补充。为了研究“浙西词派”的形成和流变过程，除了对朱彝尊的词创作实践三个阶段加以辨认外，还对厉鹗以后分布浙中及扬州、苏州等地的“浙西”宗统的各个词群作了稽考，对几乎有关的成员均做了传记提要。

我以为流派、群体的研究是“中观”研究。在形成大文学史前，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断代文学史、文体史的研究专著，而以作家论为基础的流派群体的研究则又是断代文学史，文体史得以“全景式”展现文学历史现象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和重要组合。我的《清词史》就是在经过大小十数个流派群体的综合研究之后形成的。当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历史现象各有差异，而明清时代是流派发育成熟期，其地域性，亲族性特点尤见鲜明，为此，我近年较多地关注地域文化和文化世族的现象，并尽力地追踪着史实。以上琐碎之述，从追踪史实、借重理论，到不废考据，其目的归总一点则或可谓之为“深”，追求有纵深感的深度。

谋其“新”，求其“深”，都要求读书涉猎必须宽阔，不应自我局促于一隅。宽阔，并非是个高标准要求，远非“博通”境界。博通和专精一样，岂敢轻易挂于言语间，我亦无此奢望。我的谋求阅读宽阔，一是可以开拓视野，二是针砭专业方向“分工”过于细狭，三是为有助于多侧面地裨益自己关注的课题的推进。

开拓视野，与拓宽思维空间相关，不是仅仅为了广博知识的把握。这点可以不赘述。关于针砭偏狭症，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孳生的某种畸型倾向而言。搞理论的不大关心文学史，搞古代的轻视现当代(现今则又有倒转过来的趋势)，至于古典文

学的研究又畛畦太以分明地划为好几段，搞先秦两汉的不过问宋元明清，甚而唐诗与宋词研究不相沟通，戏曲小说研究与诗词互不搭界，搞散文的绝不问津韵文，诸如此类，已是习以为常。专攻，无疑是必须的，一个人的精力和种种条件相对都有限，除了前辈大师们外，我们已不可能纵横博通。可是，文学，不管何种文体，都有着某些共通规律，文学史更有其整体性和承继性。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历史并非各自断裂的存在，源流变迁，后先承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过份地局守一摊子，于研究深度的推进看，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无益。至于要解决近古时期的有关命题，更是不能不把握源流脉承的前因，对中古、上古的文学现象务得有个较宽广的了解，不能只盲从前人的判语，人云而亦云。随便举个小例子，明清人诗文集前的序文固每多精当的评述，但有一种倾向极普遍，即喜标榜“正宗”，动辄师承“左迁”，宗法“李杜”，尤以宗杜为尚，次则“韩柳”文脉或“昌黎、山谷”诗格。谁要说某人诗学“诚斋体”之类，无异在骂他“浅率，油滑”。如果研究清人著作，而不对李杜韩柳苏黄等历朝大家的作品粗加含咀，就无法判别这些序文所言的是否真切确凿。我个人是折服于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的许多精粹之论的，如他指出郭麐、江湜的诗最得“诚斋”神髓，就是不轻从前人之说而深中肯綮的笃论。关涉到此类问题时，是与非固可研讨辨析，但只有广泛阅读，宽阔涉猎之后，方始真有发言权，不至于一味趋从古人。

至于宽阔地阅读可以有助于自己近期研究课题的推进，这已与文、史、哲本相沟通之类说法一样，也是老生常谈语。只是我个人确是觉得受益颇多的。例如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唐宋以后的文学发展历史，与封建制度的科举文化关系极大。无论从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科举一门的文献史料都可提供大量信史，综合其数据，梳辫其规律，均能俾助阐明清楚各种文学现象和背景。即使一些《齿录》以及“采芹录”或叫“诸生谱”的文献，也可帮助我们省却考据之力，澄清某些疑团。如笔者在作此短文前不久，始终对《清名家词·黑蝶斋词》的作者，“浙西六家”之一的沈岸登的

生年被定为顺治七年(1650)感到难以信实,亦不知其根据所自,但没有新的史料发覆前,只得沿袭此说。可是正是《平湖采芹录》在顺治四年的名录下明确载有“沈岸登南亭”五字,证实《清名家词》小传文字的不确。又如家乘宗谱这一支重要史料,也尚未被我们充分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来。此中不仅有大量被删除于诸家别集中的志传文学,极可宝贵,即以世系的翔实可信,就大有助于纠正许多素错的记载。如前人编总集、选本每以科第或官阶作为序列,不考其生卒或家世,结果其弊端常是父子倒列、师弟后先,极有碍于知人论世。随手可拈的例子如《晚晴簃诗汇》卷六十二,陈履平乃陈宗石次子,结果子在前,父在后。宗石是陈维崧四弟,其父贞慧卒后即以十四龄之少年远赘商丘侯家,这一支遂为河南籍。凡此之类,一旦需加引述而不明其世系,最易出笑话。至若这四十年来关于戏剧家杨潮观的考证文章共出三篇,均极见功力,然如能有总目,一查锡山《杨氏家谱》,问题解决得更顺快更准确。除此之外,我还很得益于人文地理学的著作,甚至如研究徽州地区经济商业史的书中也启发良多,使我对由歙县、休宁一带东迁江浙而成为吴越地区文化世族的情况愈益增多感性认识。

宽阔的阅读,当然不是兴之所至,流连忘返,否则必也杂而无章。总之,务须为“我”服务,为“我”所用。故我将这一读书方法姑称之为“活”。

以上所谓“新”、“深”、“活”的感受,其实全不是新鲜之见。前面提到《谈艺录》,钱先生就早已示范在先,三十年前我读开明版旧平装时即从中获得启迪。至如认为作家诗人并非孤立存在而乃群体活动问题,同辈先进学者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已先得我心,傅先生的话十年前就已讲了。

最后补充一点的是,我还极赞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人,应对当代文学文化现象饶有兴致并投以热情关注。我自己因曾兼搞过近三十年的新诗评论,尽管断断续续,零兼碎片,既无甚大成,又不免浅陋或不当,但我却确也从中很受益,古今相观照,是每能激发一些可喜的感悟的。

从「水浒传」谈古代小说的社会学研究

· 文学史百题 ·

骆冬青

中国古代小说与社会广泛而密切的多方面的联系，使其长期以来成为社会学的极佳对象。因而，从古代批评家有意无意的涉及，近代理论家的重视，到建国以来的着力研究，古小说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丰富。然而，问题也多。例如在古代小说的主题研究中，几部古典长篇小说的主题都有争议，而焦点往往集中在社会属性的判别上。像《水浒传》，长期是“农民起义”说定于一尊，但经讨论，又有“为市民写心”说，“忠奸之辨”说，“为施耐庵们写心”说，等等，各执一词，辩驳不休，足见古代小说的社会学研究中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这里不妨从《水浒传》中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开的黑店说起。他们开的这黑店，以杀害顾客、掠其钱财，并将人肉切做“黄牛肉”、剥作馒头馅卖为业。但是，张青向武松声明，他们不杀三等人。“第一，是云游僧道”，“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第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对于第一等人，一方面是“他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另一方面则因其中也有好汉如鲁智深、头陀等人；对于第二等人，“他们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好汉不英雄”；第三等人，则因“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总之，他们将自己归属于“江湖好汉”一类，僧道、倡优则因关系到“江湖好汉”的道德与荣誉而获得“放生”。而“江湖好汉”则显然并不以在社会上所处的阶层划分，虽然张青所云之三等人在水泊梁山中为骨干力量。从柴进这样的皇室后裔，到军官、衙吏、地主、土豪乃至鼓上蚤时迁这样的窃贼，都在“江湖好汉”这一总称下统一起来。因此，与其按人物的社会阶层来划分，不

如以他们共同的群体特征来研究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张青从剥人凳上救起鲁智深，“结拜为兄”，是因为“见他那条禅杖非俗”；“心里常常忆念”的那个头陀，是有两件最难得的物事——“一件是一百单八颗人顶骨做成的数珠；一件是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也自杀人不少”的好汉；对武松之景阳冈打虎固然是“闻名久矣”，而听了“武松把杀西门庆并嫂的缘由”，张青夫妻两个，欢喜不尽，则更表明了他们的价值意向。一是对武力的崇尚，一是强烈的复仇意志，而两者之统一为权力意志则为他们价值意向的核心。荣誉感、道德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鲁智深、武松这两位从十字坡酒店囹圄出来的好汉，他们的故事是《水浒传》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在鲁智深身上，也有着强烈的权力意志，拳打郑屠时所云“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可证。武松之帮助施恩“重霸孟州道”、依附张都监等行动亦然。但是，他们还重视“义”。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大闹野猪林；武松杀西门庆、潘金莲，乃至鸳鸯楼、蜈蚣岭上的行为都带着维持正义的目的。然而，对十字坡的黑店，一个与张青结拜为兄，一个结拜为弟，那“人肉作坊”中被剥皮卖肉的或许是好汉的冤魂便被置之度外了。这就表明了他们的“义”的另一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即义气。义气被置于正义之上。好汉之间的义气高于一切，正是“江湖好汉”们联系在一起的道德纽带。“义”与权力意志的结合，成为“江湖好汉”重要的群体特征。

当然，“江湖好汉”作为群体，还有其它一些特点。如不好女色，嗜食贪杯，慷慨大方等等，但是均可统一在权力意志与义气之中。如嗜食贪杯与不好女色，正是为了体力武艺，以作为伸张权力意志的基础。而慷慨大方是义气的表现。

那么，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就并不那么重要了。囚犯与衙役胥吏，像武松与施恩、宋江与戴宗，在统一的信条下统一起来。甚至原来不共戴天的仇家，也会化干戈为玉帛。因此，梁山好汉们的社会地位，正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在“江湖”与

“朝廷”所构成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之间游移的。

所以，张青夫妻的黑店一方面是属于“江湖”，反社会的；另一方面却又与那样的社会有着惊人的一致，甚至可以视作其缩影。因而，他们的野蛮杀戮，既是对社会的反抗，本身又是增加了社会的邪恶。揭阳岭的三霸等亦可如是观。这正是“江湖”与“朝廷”之间，有着共同的社会规范所造成的。

于是，若再在“义”前加上“忠”，“江湖”与“朝廷”之间的鸿沟便被填平。宋江在“忠”、“义”之间的徘徊，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既矛盾又统一的表现。其前后不同的选择之中的社会意义，也值得深思。总之，在宋江身上，这两种不同社会规范的矛盾斗争，正是梁山泊所有好汉都面临的问题。偏向哪一方面，也只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攸关，而与其它如“农民”、“市民”之类无关。

其实，作为有着复杂的社会构成的“江湖好汉”群体，还要受到民间的即一般下层社会的社会规范的影响。张青宣称不杀三等人的原因中，即有着民间规范的作用，如说云游僧道“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等就是。《水浒传》从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说话，加工为长篇小说的过程，实为一种“集体创作”过程，其中自然就渗透了不同时代的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作者”的感情意愿。这样，我们一方面可由此分析《水浒传》人物社会构成的成因，另一方面更可由此分析书中人格规范的社会属性的成因。

《水浒传》的“作者”，既有着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更有着不同时代的人。鲁迅先生曾从时代的变迁分析《水浒传》道：“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里，

鲁迅先生只谈故事的“累积”过程，而对于故事的“变异”与“过滤”则未加分析。并且，不同社会阶层的“作者”的加工对故事的社会属性的影响亦未涉及。

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不同时代民间各种人的共同创作以及一定的社会阶层对作品的“期待视野”的改变，是《水浒传》“积淀”不同思想的原因。那么，《水浒传》中不断增加的梁山好汉的社会构成呢？与罗贯中、施耐庵以及武定侯郭勋等人的加工自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服务”原则，使得《水浒传》主要是在读者群的“社会规范化”过程中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一些版本的湮没无闻，就当与读者的淘汰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水浒传》人物的社会构成中，我们主要可以看出书中反映了哪些人的思想意识。

张青夫妻除了“三等人”之外便横加杀戮，李逵常常是抡两把板斧，“不问军官百姓”，“排头儿砍将去”，吃人肉对他来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为什么充满野蛮杀戮与人食人的事件的《水浒传》竟能使不同时代的读者得到审美愉悦呢？方腊起义中，“凡得官吏，必断脍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从镬乱躬，备尽楚毒，以偿怨心”（《宋史·方腊传》）。元顺帝时，年年饥荒，发生了“人相食”，“殍死盈道，军士掠孱弱者以为食”的现象。凡此种，皆不啻为《水浒传》中的虐杀、食人的行为加上了社会历史注解。以暴抗暴与以暴易暴之间的转换，也就在对统治者的暴力行为的反抗与默认之中完成。所以，《水浒传》中好汉们的权力意志的由压抑到激扬的过程，一方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更是一种群体心理的反映。

好汉们之间的“义”，既是共同的权力意志的聚合，又是相互的利益关系所导致。“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作为梁山泊的道德准则，不仅可以满足他们自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下层阶级普遍的理想。“义”的这方面内容之所以在《水浒传》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原因即在于此。“义”的另一面，即朋友间的友情重于一切，则为下层阶级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之必需。

但是，这种“义”很容易发展为只顾相互间的情义利益，而不顾及正义的情况，如上文分析张青与鲁智深、武松间的“义”，即如此。

对于统治者来说，那种感恩戴德知恩图报的“义”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水浒传》中，此类事甚多。如杨志之于梁中书，武松之于施恩、张都监，等等。这样，我们又可以从“义”作为一种人格规范在书中的表现，来分析其社会历史原因。

这样，从《水浒传》中“江湖好汉”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特征，又可窥见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即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阶级的价值观如何在人物的情志上反映出来，并进而可以达到对时代精神等方面的研究。不同的“作者”群、读者群的交互作用使全书呈现出的思想主题的多义，仍要从作品本身的社会属性去把握，即作品是如何对待社会现实、作品中人物的情志以及行动的。对于《水浒传》来说，梁山好汉从个人反抗到联合为整体，终至走向悲剧结局的历程，正是作者价值意向的反映。所以，应当将历史与文学相对照，不可直把古代小说作为社会学文献来看。

总之，以作品为中心，从作品中看社会现象；看作者注目于哪些社会现象，如何看待这些社会现象；由此再研究作品流传中读者的社会心理。将作品、作者、读者都放在社会学的视野中进行研究，是古代小说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此，必须注重对作品作具体的分析研究，那种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简单的二分法往往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只有对人物的社会构成及其构成方式都作具体的分析才行。比如李逵“只顾杀去”的那些百姓，恐怕就包括农民、市民等各阶层的人，而他心目中只有他的宋大哥及其他的江湖好汉。古代小说之删改续补等等，使得其版本研究、作者研究都较为困难，所以从作品看作者的价值意向，由此再研究作者的社会构成也需要将其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再则，对读者的社会构成、社会心理的研究，从一些特殊读者如续书作者等身上的进行，亦可对小说史的研究中增加社会学的透视。最后，古代小说的社会学研究还必须在历史——美学的方法下进行提高，才能达到一种新的层次。

削除三藩与康乾盛世

· 历史百题 ·

李治亭

清代自康熙始，经雍正，至乾隆后期，约百余年，史称“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它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而以平定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为契机，始由大乱走向大治，达到鼎盛。

一、清初政局的新发展

终顺治之世，清廷倾注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全部军事力量，击溃并镇压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同时，扫荡南明势力，将全国置于它的统治之下。顺治十八年（1661）冬，以俘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消灭李定国余部为标志，明清（后金）长期战争基本结束，除了郑成功父子占有台湾，大陆已归于大清王朝的一统天下。清朝自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战争已经过去，一个时期相当尖锐的阶级的与民族的矛盾已趋于缓和，这就为清朝走上新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战争的迅速胜利，只解决了公开的阶级与民族的武装对抗，但却掩盖了社会的其它次要矛盾；不被人们觉察而隐蔽的矛盾也在酝酿发展着。这些矛盾，在康熙即位后，逐渐显露出来。而主要的矛盾，已从外部转向统治集团的内部。

首先，在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形成以鳌拜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他凭其辅政的权势，继首辅大臣索尼之后，独掌朝政，将皇帝置于他的挟持之下，这就使他与皇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康熙以“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将鳌拜逮捕，使这一矛盾得到顺利解决，避免了最高层的分裂，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发展。这一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加强了皇权，为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中央集权，扫清了政治障碍。而三藩同中央的矛盾逐渐激化即根源于此。

其次，是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割据势力。这一严重矛盾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漫长过程。

清军进关后，随着统一战争的不断胜利，数以千万计的明朝将吏士卒、农民军余部被收降、改编，成为清军的组成部分。从中央大员，到地方的封疆大吏，国家政权的各个部门无处不充斥了汉官汉将。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等四王，就是汉官汉将的代表人物。他们原都是明朝的将官，在明朝衰亡之际先后投降了清（后金）政权，而在灭亡明朝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立功封爵。顺治九年（1652），孔有德兵败桂林，自杀，无子爵除，剩下吴三桂王云南、贵州，耿继茂（耿仲明之子）王福建，尚可喜王广东，史称“三藩”。所谓“三藩问题”由此而产生。

三藩问题的实质，从统治阶级方面来说，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对立；从民族关系方面来说，则包含了满族贵族同汉族主要是原明朝将吏及原农民军将士所形成的政治军事势力的矛盾，它反映了清初民族矛盾的内容。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日益激化，使三藩问题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

吴、耿、尚三藩在清统治集团中占有特殊的利益，享有种种特权。要而言之，三藩皆握兵权，各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视同他们的私人武装，有完全的支配权。在经济上，自行收税，百般聚敛财富，时称尚藩之富“甲于天下”。但他们及其所属俸饷全仰赖朝廷。顺治十七年，户部奏：云南岁俸九百万两，加上闽粤两藩，达二千余万两。邻近各省供不应求，皆取自江南各省。所谓“天下财赋米耗于三藩”（《圣武记》卷二“康熙勘定三藩记上”），实非虚语。在政治上，他们位居王位，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连朝廷大员也不敢触动他们。尤以吴三桂为甚。朝廷规定，凡所请应行之事，“内外衙门不得掣肘”。三藩在地方多行不法，且生活极其奢侈腐化，如吴三桂以原明桂王五华山旧宫为藩府，其规制与

富丽可比皇宫，掠买美女，藏于后宫，拥姬宴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超出法规的权益，多为朝廷所特许，而超越特许的部分，亦默认不究。因为当时无论云贵、两广，还是东南沿海，局势还很不稳定，朝廷极需他们弹压地方，不惜给予种种特权，“便宜”行事，希图以恩宠结其欢心，竭诚“屏藩王室”（《明清资料》丁编第8本）。但是事与愿违，历史的演变却走向了朝廷愿望的反面。它的一系列政策，竟鼓励和培植了三藩实力的急聚增长；同时，也助长了他们与朝廷的离心力。其结果，必然与封建的中央集权不相容，矛盾日益加剧，或迟或速，以不同形式反映出来；处理不当，就会变成公开的对抗和冲突。这一点，已为后来的事变所证实。

二、平叛止乱再统一

康熙帝即位前后，已觉察到三藩问题的严重性。在其即位后，把三藩问题列入当务之急，时刻寻找时机加以解决。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为由，主动申请撤藩，“归老辽东”。康熙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批准。此举深深地震动了吴、耿两人。他们已看出朝廷急欲撤藩的意向，惶惶不安。为消除朝廷的疑虑，先后被迫上章请撤。而吴三桂根本无意撤藩，思想毫无准备，而且心存侥幸，以为朝廷必予“慰留”。不料，弄假成真，康熙朝纲独断，力排众议，同意撤藩。在这个重大问题面前，康熙采取三藩同撤，未免操之过急，以为一道“圣旨”就解决问题。他没有估计到撤藩已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将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对抗，更没有估计到三藩特别是吴三桂带头发难。如果他采取其它缓进的方式处理，当时是有可能避免一场厮杀的。由于康熙的做法简单，策略失当，触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进而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大爆发。

同年十一月，吴三桂首先在云南起兵，公开抗拒朝廷撤藩。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迅速率大军经贵阳北上，所向